

# 胡适 1926 年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访问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市 100871)

**摘要：**1926年夏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时途径苏联，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生长谈。这次访问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与胡适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谈政治”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相关。胡适那时特别强调努力肯干，给人以“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但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而其“重在行动”的取向则给予胡适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使其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都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容纳一般人眼中美国与苏联对立的政治和社会取向。

**关键词：**胡适；莫斯科中山大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1926年夏，胡适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径苏联，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sup>1</sup>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生长谈，校长拉狄克也参与，这次谈话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sup>2</sup>可惜在场的中大学生和苏联方面的记录现在尚未发现。<sup>3</sup>近年发掘出的胡适日记留下了他自己对此事的记录。目前我还见到的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稍更深入的体会。<sup>4</sup>

两份他人叙述都是出自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自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对其所述内容本文会适当进行通常所谓“去伪存真”的考辨，但不侧重于此。盖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其实就连档案中也包括着虚构成分，若进一步深入考察，“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本身也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事真伪之外的论世知人的内容。<sup>5</sup>本文也无意于此，不过为使有此兴趣的同仁可资参考，谨将几份叙述文本稍详细地摘录在下面。

## 一、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几份叙述文本

先看两项回忆。曾就读北大的毛以亨 1926 年曾追随冯玉祥到苏联，他记载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共产党与其同路人，后来就以骂胡适为原则，好像要谈革命就非先革胡适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对胡氏的态度并不如此。以后中国学者如非革命党人要去参观就不许了，张君勱先生过俄时即想去孙逸仙大学，终于未得其门而入。<sup>6</sup>

汪菊农本人是留俄的学生，但胡适到中山大学时他因病在克里米亚疗养，所以他的记录也是听同学转述的：

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

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sup>7</sup>

我在 1994-1995 年间撰写《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时，关于此事的叙述主要依据汪菊农的回忆（毛以亨书也曾读过并抄有卡片，一时找不到，只记得拉狄克等的“愤怒”）。<sup>8</sup>拙作出版的次年，胡适当年游俄时的日记就由耿云志先生找到并整理刊发在他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 2 辑上，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胡适自己的记录说，他于 7 月 29 日下午 2 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往中山大学：<sup>9</sup>

旅馆中有浪人名 Dobbin 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 Radek，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 Karakham 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7 月 31 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 XX，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 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 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8 月 1 日）：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8 月 3 日）：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图略）。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

- 1、有计划的政治。
- 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
- 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
- 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这是我要向《再造文明之梦》的读者致歉并正式更正的。就整体事实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sup>10</sup>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

以互补。

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当时《晨报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就看出胡适“明显地流露出一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他发现，胡适“近来的精神”就体现在“他那‘肯干’‘能干’的豪气”。<sup>11</sup>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一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反之，如果国内政局纷乱，连中国人自己都还想寻求租界等外国在华势力的保护，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sup>12</sup>胡适在访苏结束时有心出来组党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见前引日记），不过是其一贯思想的具体化而已。

汪菊农的回忆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表彰苏联不够，而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这的确是中共对胡适最不满之处，恽代英曾经与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sup>13</sup>他到1926年也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sup>14</sup>可以说，胡适与中共当年在政治主张上的一大歧异，就在反帝方面。但这一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所取的联合态度，胡适访苏期间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争取”的努力。

## 二、胡适在“新俄”震动下的“兴奋”

五卅前中共希望联合胡适等人的期待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相当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在张彭春看来，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獠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他们既“主张用外交机关，承认已有的政府，缓缓进行”；又“鼓动国民救国，对内对外同时用力，以群众运动为工具，以赤俄为模范及后援”。<sup>15</sup>

按张彭春的观察大致准确，1923-1924年间中苏两国就恢复邦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局时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相当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正常程序的举措，却恰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之应和。如一般并不视为特别激进的张君勱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sup>16</sup>

1925年下半年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在北方高层次知识分子中引起一场大争论，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这与北洋军阀的“反赤化”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sup>17</sup>张奚若那时便说，“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令人非常可佩”。<sup>18</sup>发表反共反苏言论已需要勇气，可见当年世风有

多么激进。那年末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北京政局一度出现左倾的趋势，张彭春自己也因“北京国民党得势”而感觉“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乃“专看俄国革命书”。<sup>19</sup>

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与思想界上述倾向非常接近，他自己应该就是张彭春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其在1926-1927年间的言论应可以算相当亲俄。从前引日记可知，胡适甫抵莫斯科即径往中山大学访拉狄克，很能体现其心情的迫切。他在当面称赞苏俄时仍保持着一定的分寸（如前所述，这在他个人而言赞美已不算低），只不过是秉其一贯的立场；观其在寄往国内的书信及稍后的文章中大大赞新俄，甚至引起许多政治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开或私下的质疑，便最可见其心中的真实感受。<sup>20</sup>

而且，胡适在1925年所作题为“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的演讲中，因其听众是教会大学人员，曾明言：以收回租借地和废止不平等条约为代表的“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a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他对中共党人赞扬义和团并不赞成，但在文中大量正面引述中共的反帝观点，然后指出：“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借。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sup>21</sup>这些言论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主张反帝的中国人之足够注意，尚难确定，但对中外关系言论有特殊关怀的苏俄在华人员却很可能注意及此（待考），故苏俄与中共曾对胡适的访问寄予厚望。<sup>22</sup>

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对胡并不取“骂”的态度是个敏锐的观察，时人传言中的学生“齐集车站欢迎”虽非事实，仍揭示出某种心态；那时正与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于右任当晚即往访胡适（后来胡适正在于舍见到蔡和森等），颇能印证中共和苏俄确实对胡适的访问期望甚高。这里很可能有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为胡适写介绍信给拉狄克，更说明中共和苏俄的确非常想“争取”胡适；蔡和森与刘伯坚在“舌战”后仍希望胡适能“在俄国久住一些时”日，提示着他们并未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

实际上苏俄已尽量努力影响胡适，且其努力还相当成功。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连续安排其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让胡适从不同侧面认识新俄。从胡适那两天的日记看，他的观感和反应完全是正面的。第一监狱是关押重罪犯的，胡适看到“每2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8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作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sup>23</sup>

在胡适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邻室恰有一位苏俄外交委员Theodore Rothstein，在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亲美而不那么反帝且怀疑苏俄的专政）后，Rothstein指出，“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为，“此言却甚有理。我看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的面孔”。<sup>24</sup>

当然，胡适也不止听信苏俄的“一面之辞”，他与那时恰在莫斯科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 E. Merriam两次交谈，第二次更“谈甚久”。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Merriam）以政治学说史家的眼光看苏俄，感想如何？以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的存在，于自由的关系如何？所谓Dictatorship的时期究竟何时可终了？既不许反对党的存在，则此训政时期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Merriam答复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基本接受这一解释，以为“此论甚公允”。<sup>25</sup>

他立刻将这位教授的观念引用到寄回国发表的书信之中，指出专制必愚民，而苏俄则“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治制度”。<sup>26</sup>的确，在斯大林 1927 年完全掌握苏俄权力中心并推行依靠自己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之前，苏俄曾努力想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教育也颇受美国影响，胡适的老师杜威即曾“大夸许苏俄教育”。<sup>27</sup>胡适在莫斯科期间特意阅读了苏联“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其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sup>28</sup>大概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 1930 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sup>29</sup>

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sup>30</sup>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

这样一种观念的巨变，显然与胡适对苏联现象的现场观察直接相关。正如徐志摩所说：“你一出游去，不论你走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过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sup>31</sup>

的确，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监狱的现象对胡适而言正可谓“求仁得仁”（若后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适本人的要求，说明俄方对胡适还确有几分“了解之同情”）。如果苏俄和中共对胡适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的邀请可能有些失望，他们随后即从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苏俄新气象的真正影响力。胡适到美国后得知，李大钊曾提出，“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sup>32</sup>看来中共对“新俄”的魅力颇具信心，故希望能进一步向胡适展示。<sup>33</sup>

从胡适与前引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可知，怎样认识苏俄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那时特别关注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关键。任鸿隽虽然同意胡适所说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底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

34

对胡适而言，任鸿隽提出的关键问题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帮他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用孙中山的“训政时期”来指谓苏俄的“一党专政”，这既提示出他对国民党政治的某种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问时已将苏俄的“一党专政”预设为一个可以有下限的历史时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这里也隐伏了胡适稍后对国民党的正面肯定：既然苏俄的“训政时期”可以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sup>35</sup>）。

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是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

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sup>36</sup>

徐新六的观察甚敏锐，“力大”（因而效果明显）正是新俄对胡适（及其他许多人）的魅力所在。他的问题实际是：对苏俄的“共产”和“党治”，中国究竟学不学？如果不学，又学苏俄的什么？胡适那时主张向俄国人学习的，首先是“努力肯干”的认真精神，多少带有前引伯山所谓“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可以说，重在行动是胡适当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一些在常人看来矛盾、冲突或对立的政治趋向才可能被胡适“兼容并包”而熔于一炉。不了解这一点，就较难对胡适那段时间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解之同情”。

任鸿隽关注的“俄国式的劳农专制”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本实际存在，许多人由此视角看问题亦甚自然。如张忠栋曾提出，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了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sup>37</sup>此说颇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恐怕误解了胡适。胡适当然更加认同美国，不过前引其1930年关于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断言表明，胡适认同美国方式并不以放弃对苏俄的兴奋为代价，他本人即曾明言自己对新俄的梦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sup>38</sup>

张先生似也过于夸大了苏俄之后的欧美观感对胡适的影响。从前引胡适日记及毛、汪二位的回忆看，胡适在苏联时就公开表述了其倾向美国的态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学生的不满。可以肯定，胡适在莫斯科时就未曾疏离于美国式政治，完全无需到欧美考察后（胡适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看广义的“欧美”或“西方”政治，他当时公开说英国不足学，可知其在英国的观察较多负面印象，这与他到苏联的颇多正面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别注意）再“重新”认识到美国方式的价值或“回归”到美国方式。<sup>39</sup>

不过，若用之于中国，胡适却并非完全认同美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强调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他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人为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列为其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其设计的自由党“党纲”凡四条，其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此可与徐新六所说苏俄的“政治上党治”和“经济上共产”之两大“试验”对看）。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反帝一方的思考。

另一方面，胡适承认和接受苏联所进行的“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并不意味着他已认可苏俄的政治方式，对此他有着明显的保留。与张忠栋相似，张太原也特别看重苏俄之后的欧美观感对胡适的影响，他认为胡适一度因其对苏联的好感而对中共“颇抱同情”，但“他历经美国后，这种本来就较勉强的‘同情’便很快消失了”。<sup>40</sup>如前所述，胡适这段时间对苏联的好感是持续的，则其对中共的“同情”无论有多“勉强”，也未必因“历经美国”而消失。观其仍用“朋友”来称谓其批评对象，便可知其仍维持着“诤友”的态度。同时，胡适对苏俄政治方式的保留也是持续的，无需到美国后才改变。

在离开莫斯科时的私下思考中，胡适显然认为：若用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政治”来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似乎比强调阶级斗争和“一阶级专制”的苏联方式更合适于中国的国情；恰因不甚赞同正仿效苏联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sup>41</sup>

从学理上言，胡适那时特别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前引日记中有一段极其值得注意的话，即胡适发挥其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历史眼光”，提出“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一些面相开放。

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即反复对英国人强调：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认为西方人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已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

文明做出的贡献，即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sup>42</sup>

可以看出，胡适那段时间虽然给人以“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但主要是针对他所认知的国人“政治活动能力薄弱”这一缺失；他那时当然特别强调努力肯干，但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而其“重在行动”的取向则给予胡适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使其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都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容纳一般人眼中对立的政治和社会取向。尽管胡适组党“干政治”的冲动后来未能付诸实践，有关他1926年对莫斯科中山大学访问的几项记录却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其当时的心态和思考。

## Hu Shi's Visit to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Moscow in 1926

Luo Zhitian

(Histor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1926, Hu Shi had dropped in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Moscow on his way to Britain to attend the meeting on indemnity of the War of 1900. He had a long chat with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at Zhongshan University. This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his career for it reflect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PC and was linked with his series of political speeches and actions after his starting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is chatting left an impression on the students a tendency of “action without any theories and by hook or crook.” In fact, Hu had his theoretical base, namely, the common base for modern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Hu Shi attached importance on action providing him more room of action and allowed some latitude, so that he got more openness and tolerance both in principle and in practice to accept the opposit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ent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viewed by average people.

**Keywords:** Hu shi;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Moscow; liberalism; socialism;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a

**收稿日期:** 2003-10-31

**作者简介:** 罗志田，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sup>1</sup>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见M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沈寂先生最近讨论了胡适访问莫斯科一事，他虽基本未对既存相关研究做出因应，其文大体平实地引述了胡适日记，参其《胡适访苏及其感受》，《近代中国》第150期（2002年8月25日），117-128页。

<sup>2</sup>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中共的关系应置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谈政治”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中考察，并当注意其那段时间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思考。这方面近年的论述包括李达嘉：《胡适在“歧路”上》，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13-252页；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26-274页；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

<sup>3</sup>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专门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余敏玲教授，她说未见关于此事的俄文记录。胡适日记中提到积极参与谈话的学生如蔡和森、刘伯坚等皆中共党员，以中共和苏联方面对此事的重视（详后），我猜想当年应有某种形式的记录或报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搜寻。

<sup>4</sup> 胡适当年游俄时的日记不知为何没有收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后由耿云志先生设法找到并整理刊发在他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上，现已纳入本文所用的《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以下简作《胡适日记》）。

<sup>5</sup> 参见Natalie Z.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 111-114. 该书近已有中译本：《档案中的虚构》，杨逸鸿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可参看32-51、302-309页。

<sup>6</sup>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83年，166页。

<sup>7</sup> 汪菊农：《胡适二三事》，收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0页。

<sup>8</sup> 我的书中说：“胡适到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曾齐集车站迎接，据说是盛况空前。胡并到中山大学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在赞扬了苏联革命的成功后，也不忘记表扬他所喜欢的美国，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亲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文化人才，以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结果弄得听众大不愉快。拉狄克尤其愤怒。”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2页。

<sup>9</sup> 本段与以下数段，《胡适日记》，1926年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8月3日，第4册，235-239页。

<sup>10</sup> 两位叙述者各自的立场值得注意，毛在海外，基本倾向于胡适一边；汪则大致站在中山大学学生一边，惟其与胡适有个人关系，也颇注意不把胡适“讲坏”（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转引自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书店，1993年，339页）。

<sup>11</sup> 关于胡适对苏俄的赞颂，参其《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卷一，73-90页。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3页。

<sup>12</sup>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1年8版，卷三，128a-128i页。

<sup>13</sup> 按恽代英在约1919年8月曾致信胡适说：“我相信善人应该做事，这是救中国，亦是救世界的唯一方法。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让不善人做了。”恽代英致胡适，约1919年8月21日，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36册，531-532页（关于此信的日期，恽代英日记1919年8月21日记其“写致适之先生信”；次日记其“写致东荪先生信，与昨致适之先生信，皆我联络善势力，以得正当助力之企谋”；同年9月8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一个重点内容仍是好人应养成善势力以扑灭恶势力，与致胡适信内容甚接近，似可暂时将此信系于8月21日，参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609、610、621-625页）。类似的观点恽代英至少持续到1923年末，参见代英：《怎样才是好人》，《中国青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1期（1923年10月20日），3-6页。

<sup>14</sup>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原载《广东青年》4期（1926年6月30日），收入《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826页。

<sup>15</sup>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sup>16</sup> 《晨报》，1923年9月11日，6版。关于《中苏条约》和中苏谈判过程，参见何艳艳：“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述论”，四川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论文，1999年5月。进一步的例子是，曾在欧洲学国际法的周鲠生稍后在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革命的外交》一文，主张“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同时更要“利用民众势力”，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革命外交的“要诀”。他更明言：“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入其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1-11页。

<sup>17</sup> 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sup>18</sup> 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13页。

<sup>19</sup> 张彭春：《日程草案》，1925年11月30日、12月27日。

<sup>20</sup>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1-354页；《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31-233页。

<sup>21</sup>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胡适文存三集》，卷九，1159-1162页。

<sup>22</sup> 或正因此，胡适虽努力说好听的实话，而苏俄和中共皆以为胡适的亲俄表述尚不够，大致也是事实。

<sup>23</sup> 《胡适日记》，1926年7月30日、31日，第4册，235-236页。

<sup>24</sup>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日，第4册，238页。

<sup>25</sup> 《胡适日记》，1926年7月31日，第4册，235-236页。

<sup>26</sup>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5页。

<sup>27</sup> 《胡适日记》，1934年5月31日，第6册，389页。并参见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40-43, 74-76.

<sup>28</sup> 《胡适日记》，1926年7月31日，第4册，236页。

<sup>29</sup>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第5册，681页。

<sup>30</sup>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73-90页。

<sup>31</sup> 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17页。

<sup>32</sup> 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61-62页。

<sup>33</sup> 两次试图增强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为后来中共不欣赏胡适的伏笔。

<sup>34</sup> 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径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411-412页。

<sup>35</sup> 关于胡适与国民党，参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26-274页。

<sup>36</sup>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19-420页。不过，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身在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稍后就告诉胡适：先生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6页）。

<sup>37</sup>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37页。

<sup>38</sup> 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351-355页。

<sup>39</sup> 张忠栋观点的影响迄今不衰，张太原最近在引用其上述观点后说，“到30年代，苏俄取得的‘新成就’，又重新燃起了他[胡适]对苏俄的热情。他把苏俄看做与美国同样先进，但取径却不同的国家”（参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4期，63页）。按张先生此论无注，前后亦无相关论述，不知其何所本？胡适既然保持其对新俄的梦想，本无所谓中断，何来什么“重新燃起”？且胡适既明言“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则两国的“取径不同”何在，似宜再作说明。

---

<sup>40</sup> 张太原前引文，61页。按胡适在游美后的确指出：“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在许多朋友却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见其《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63-64页）？我们现在尚不知道胡适与蔡和森辩论的确切内容，我倒倾向于认为，胡适访苏的当时及稍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凡是涉及对中共有所批评的言论可能都与那次胡蔡“舌战”相关，有些恐怕就是将辩论中的话重述一遍，并不需要美国观感来支持。这当然只是“大胆的假设”，但不同意“拿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正可与汪菊农回忆中胡适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辩论内容相呼应，似可作为这一假设的旁证。

<sup>41</sup> 我过去曾说胡适此时干“什么制度都可以”的干法“后来证明仍未出议政的范围”（《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31页），这只能是就其实际行为而言，从其日记最后的组党打算看，我至少低估了胡适当时的雄心。

<sup>42</sup> 参见胡适“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5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均为当地报纸报道，附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同日的条目中。更详细的论述见胡适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刊发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I: 6 (1926), pp. 265-279；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 ed., *Wither Manki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29, pp. 37-41.